

我舅父蒙浚生与杨虎城将军

自杨将军遇难后，多少年来，总想写一点什么，却一直未能如愿。今天决心提起笔来，一则悼念杨将军在天之灵，一则以慰个人对将军之怀念。不过我所要写的，只是我接触过的关于杨将军的一些琐事，特别是杨将军与我舅父之间的一些片断。

提起杨将军，自然回想起我的舅父蒙浚生。舅父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都是与杨将军分不开的。他是在一九一六年于同州当杨所部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杨任支队长时，第一个辅佐杨的知识分子。至于他们之间的相识，还远在这以前。因杨是蒲城甘北人，舅父是孙镇人，两处相隔咫尺。辛亥革命前，由于清政日紊，国势濒危，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杨即在

本县北部一带组织零星武装，从事革命活动。舅父自省高等学堂毕业后，亦慨然加入同盟会，从事于政治活动。辛亥革命后，舅父在陕西革命督军府掌理文书。于一九一三年出知麟游县事。杨于一九一四年打死恶霸李桢后，曾一度流亡于舅父处。舅父勉励杨仍然回乡继续努力组织地方工作之开展。一九一六年陈树藩督陕，舅父从曹世英部之陕北，继而转战于关中同朝一带。当时曹任陕西陆军第三路司令，舅父为参谋。杨为了他的部队正规化，接受了曹的改编。但杨当时提出唯一的条件是请蒙先生帮助他，为他担任部队整训的工作。经过磋商，舅父终于答应了杨的请求。从此，他们便结成了亲密的战友。

据舅父云：杨不仅认真训练部队，更抓紧自己的学习。舅父除担任部队训练外，并组织杨部家属学习文化。以此，部队官兵及家属对舅父均以“蒙老师”“蒙先生”称之。杨则一直称舅父为“蒙哥”。舅父回忆说：“杨天资聪敏，记忆力过

人，知识越来越广泛。每日习大字数张，并按计划学习文化及军事知识等。杨与舅父在长期共处间，情同手足，亲如骨肉。并肩携手转战于陕境南北各地，杨对舅父视之如严师益友，舅父对杨的事业则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他们的友情，数十年如一日。

我认识杨先生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初春。其时杨部历经曲折的道路和艰苦的战斗，已成为一支有力的正规化部队了。杨已升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舅父为参谋长。师司令部驻三原北城，舅父以回蒲城家乡将我带至三原上学。回到三原北城后街寓所后，第一位来看舅父的便是杨先生。舅父把我叫到跟前给我介绍说：“这是你杨叔，就是我给你讲的杨虎臣师长”。他穿一身普通军装，腰间皮带上插一支小手枪，目光炯炯，精神充沛。他一见我便问多大岁数，念什么书等，和蔼而又亲切。此后，我便以杨叔称之。继而，不少人都来了，房里房外站满了人，有穿

长袍的，有穿军装的，杨叔这一天一直与舅父谈话，至晚，来人陆续离去，只剩杨叔一人，还是与舅父孜孜不休地谈论。当晚就与舅父同榻。

第二天，来人仍不断，接连每日如此。舅父则很少出门，杨叔是每日必来，有时一会儿便走，有时则待大半天，而晚上大多与舅父同住一个炕上。在此期间，我认识了不少人，他们大都是舅父的老朋友和老同学，如张瑞卿、韦协度、苏仲彝、赵子愚等。另外，军人中如李子高、孙蔚如、赵寿山等。杨对这些文人学士非常尊敬，看不出他们之间有所谓上下之分，这些老先生中，有的任参谋，有的任参议，而杨均以“某某先生”称之，他们对杨亦称“杨先生”，唯独舅父对杨直呼“虎臣”。

舅父处从来人多地方小，我一直与舅父同住一个房子，舅父住炕上，我与表弟占下边一张小床。杨叔这一时期与舅父同住炕上的时候多，他们的话总是谈不完，而且常常谈到深夜，杨的警

卫员也得知师长晚上来后不再去哪里，因而便早早地进入梦乡。杨叔问我：“早上你能起得早吗？”我说：“能”。他多次叮嘱说：“你醒来早叫我，我起早时叫你”，事实上，杨叔叫我的时候多，我叫他的时候少。他是每天早天麻麻亮就起来，要去红坊场检阅部队的操练。一天两次。早晨一次，下午一次。舅父则是下午去的时候多。每天早起，杨叔都是紧张紧张，我一起来，就去打洗脸水，当时家里还没有电壶，只有一个大暖壶，是用棉花套包起来的，因为来人多，有时暖壶里的开水早就喝完了。多少次我去倒暖壶里的水，只剩下一点根子，我就对杨叔说“暖壶里没有开水了。”他就叫我去打凉水，总是说：“来，一块洗！”杨叔洗完脸就匆匆而出走，，这才喊他的警卫员，两个警卫员经常是一骨碌爬起来，顾不上洗脸，一边扣钮子，一边手提着匣子枪在后面追。

杨叔这一时期在舅父家吃饭的时候多，看样

子，他是爱吃舅父家的家常饭；当然，也是为了与舅父商量事情。舅父家的饭经常是四碟小菜，有肉的时候很少。吃饭是在舅父的厦房中间摆一张方桌，方桌上一边摆着两把椅子，下边是三条长橙围着，每次吃饭的人通常不超过七八人；姪母老是带着表妹等在厨房门口的小桌上吃，起先我也是同姪母在一处吃，由于有时帮忙为前边桌子上端饭，也就固定在前边吃饭。说起来也有意思：舅父老是占他的主位，上边两把椅子，七外爷不坐左边，一直坐在右边。客人们多次让杨叔坐左边第一个椅子，怎么说，杨叔也不肯坐；没奈何杨叔就说叫我坐了，我也再三不肯，我想在这么多长辈面前，我怎能坐第一位椅子呢？可大家都这么说，结果舅父也笑了说：“没人坐，你就坐了。”就这样，这把椅子便成了我固定的座位。七外爷不在时，便由我和表妹占据着。

杨叔没有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一心扑在练兵上。我也常常去红坊场看部队操练，杨叔则

在那里跑来跑去，指挥这，指挥那。部队也常做各种竞赛活动，观看的人不少，活动结束后，照例由杨叔讲话，他的话简短有力，激昂慷慨，对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起着有力地作用。军纪非常严明，有几次是给团体和个人发奖；可有一次则是惩罚一批人。那天，会场布置森严，台前跪有十几个人，宣布犯有严重罪过的人要杀头。下跪的人，个个面如土色；可杨讲话的结果，只惩处了一个人，其余均免了罪，令其归队。作到惩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效果。

我还记得一件事：一次，杨走在街上，后边较远地跟着两个警卫员。突然，对面碰见一个连长，后边却跟着六个护兵。连长立正向杨敬礼，杨一看见，便给了连长几个耳光。连长立即跪下，跟的护兵也都一齐跪下，可杨并没有讲什么便走了，过了好长时间，他们仍然跪在那里。后来两个军官到舅父处求救，讲了经过，舅父问犯了什么错，却都说不上来。舅父笑了笑说：“叫

回去吧”。第二天，杨在集合时讲了这件事，且很震怒。原来，当连长敬礼时，杨看见连长中指上戴着个金戒指，并带了那么多的护兵。因为杨一再禁止不准任何人戴奢侈一类的装饰品，也不准随意带着兵在街上耀武扬威，正好这位连长犯了纪律。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杨的治军之严。

这时，正是北洋军阀镇嵩军刘镇华进入陕西横行霸道的时候。这股匪军，到处搜刮民财，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其苦。杨部为了策应广东革命政府北伐大计，有着强烈反抗北洋军阀的愿望。故此，杨不仅加强部队的训练，还到处宣传讲演。他所到之处，慷慨陈词，激励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三原本来是辛亥革命以来渭北革命的策源地，也是这一带的文化中心。人民有较高的革命觉悟；而杨部在此作广泛的革命宣传，更具有积极地现实意义。

就在这年四月间，杨部为了抗击刘镇华部，厉兵秣马，大部军队开赴西安前线。舅父以参谋

长职务，随军前往，由李子高留守三原北城。这一去就是八个月，即经历了“二虎守长安”——“西安围城”这一艰苦岁月。所谓“二虎”，乃指杨虎臣与李虎臣。实则杨部是主力。他们在“围城”中付出了最大的力量和艰苦的战斗。八个月守卫西安城的结果，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此，杨的声望，更为人民所敬仰。舅父在“围城”中，以深谋远虑，特别在团结各方面力量上起了应有的作用。故当时大家均以“蒙丞相”称誉。杨先生在围城前原名“虎臣”，舅父建议将“臣”改为“城”，杨欣然同意。这样，真的竟使西安城成为坚不可摧的“虎城”，以至使刘镇华匪军败于“虎城”之下。此后，杨便以“虎城”名之。同时舅父也给他自己的名字也改了一字，舅父原名“浚僧”，“围城”中他将“僧”改为“生”。很显然，有着新生的意义。

西安解围后，由于种种原因，杨部便移住三

原一带。舅父回来后，亦即寓居于三原北城。杨一度住东里堡，仍不时来舅父处。一九二七年杨就任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职。率师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舅父为留守。在这大动乱的年代里，经过“四一二”蒋介石的背叛革命，以至蒋、冯、阎南北战争序幕的开展。期间军阀割据，中原地区形成一片混乱。杨部东出后，亦遭惨重损失。杨以积劳成疾，于一九二八年赴日本休养，并借以考察日本军政情况，以便伺机东山再起。舅父在留守期间，为了保存杨部这一战斗力量，呕心沥血，沉着冷静，应付当时那个错综复杂的局面，终于保持了这一革命力量的独立性。乃于一九二八年冬悉发后方部队从之胶东军所，与那里新整顿的部队汇合。旋即致电旅居日本的杨将军，促其归国。杨回国后，战友重逢，喜不自胜。舅父不负杨的重托，将部队移交于杨。但以多年积劳，决然离开部队去杭州休养。

杨回队后，似鱼附水虎归山，转战于豫东一

带，捷报频传，以至扩编为第十七路军，杨任总指挥。继而出任陕西省主席。杨主陕后，即敦促舅父回陕。这时舅父已由沪杭转赴汉口，旋去天津。杨虽一再电促，舅父一直迟迟不归。据说：杨急于敦促舅父回来的目的，一则商讨主陕大计；一则让舅父主民政厅。但舅父认为多年与杨患难与共，今日总算大功告一段落；且杨而今周围人才济济，无需个人再煞费苦心，故决然隐退。直至听说杨的人事已安排好了，这才归来。多少老前辈论及舅父这一高风亮节，都无不为之感慨！

舅父回来后，在西安稍事逗留，即返三原。这时舅父健康尚未恢复，日每习字看书，偶有所感，发之于诗。杨则不时返三原，一则老太太居东里堡；一则来看舅父。杨由于政事纷纭，每来即仓促离去。但返西安后，仍不断地给舅父来信。每次来信，都是用大信筒装得厚厚的，字是用正楷大字书写。他为了写信，也是为了练习

写大字。信上除论政事外，总是让舅父评论他的文和字。舅父每读杨的书信，都显出啧啧称赞的笑容。有几次舅父也让我看杨的书信，并且说：

“你看，你杨叔这个人，心劲很大，干什么都有毅力，写字也是这样。”他拿这些话来启发我们。

一次，杨先生来三原，又先到舅父处，寒暄数语后，即对舅父说：“蒙哥，省上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要到南京去开会，大家推选由你率领。”说着，随从秘书将一份名单呈给舅父，舅父接过名单，戴上光镜，顺便一看即从桌子上拿起笔，蘸了墨，很自然而又决然地把写在代表名单上第一名的“蒙浚生”三个字用粗笔抹去。紧接着对杨说“谁叫你写我的名字？”杨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大家决定的。”舅父带着生气的口吻说：“我能给他老蒋去稍息立正吗？”杨则赫然一笑，再没有说什么。转过脸对我说：“你看你舅的脾气！”我没有敢插嘴，杨叔跟着又转了

话题说：“蒙哥，上次我给你买的书，大概最近就可寄来。”舅父改容笑问：“什么书？”杨说：“是商务印书馆的大部丛书，主要是《万有文库》，还有学生国学丛书等。”舅父连说：“好得很！好得很！”此后，杨每来总要说：“蒙哥，有好书，你就把名字给我开来，我给你买。”舅父说：“好”。舅父一生不置产业，唯一的嗜好，就是书；偶而收集一些名人字帖、字画等。

一九三一年暑假，杨为老太太在西安祝寿。着两部汽车接舅父全家到西安，下榻张家巷。这是一所宽大的四合头院，房屋整齐，摆设俱全，花木也点缀得适宜。我们到后不一会儿，杨先生和夫人孩子等都来看舅父和妗母来了。这天，杨穿一身灰绸大褂，戴巴拿马草帽，俨然乃一文士，不像是个军人。他与舅父见面后，谈笑自若，精神饱满，顺便问起舅父这个房子怎么样？舅父说：“太好了。”临走时又对舅父说：“把

我的汽车给你留下”，舅父一再拒绝，杨却似未听见。第二天，舅父看见派在他这里服务的人太多，总共有十来个，舅父顿足说：“哪儿要得了这么多的人？”最后只留下一名厨师和一名副官，其余的都叫他们回岗位上去。

在庆祝杨老太太寿辰的那一天，一大清早，舅父便带了我们全家去杨府。杨这天很忙，但很高兴，到处招呼来宾。早饭后，杨来问舅父说：

“蒙哥！看不看送来的礼物，里边有不少的好字和诗文哩！”舅父欣然说好。其时姪母已带着表弟妹等由杨夫人陪着看戏去了。舅父带我还有几位老先生，由杨叔作响导，到各处去鉴赏所送来的礼品。遇到匾额，对联，中堂等有文字的地方，杨叔和舅父总先叫我念给他们听，他们不时称赞某个诗文的好坏或哪个匾额的字写得不错等等，看来杨叔所知道的东西也真不少。几天来，我们每天都去杨家，但舅父一次汽车也没坐过，总是带着我们步行。

舅父在“家”的时候多，杨当然常来。一天，杨一进门就笑着给舅父说：“蒙哥，这个院子已经给你买好了，是送给你的。”说着由随从副官给舅父呈上办好的“房契”。舅父接过来连看也没有看，绷着脸一下子就将“契单”摔在地上，紧接着说：“谁叫你给我买房？”杨说：

“你这里又没有固定的住处，这不是现成的吗？”舅父说：“三原那一点房就够我住了，我不要。”杨沉思了一会，又说：“要不然把咱县槐院我的那院给你。”舅父连说：“不要，不要。”杨只好无可奈何地默默无言了。停了会，舅父意味深长地说：“我不给孩子置产业，更不在大城市置家当。”回过脸来，特别对我说，同时也是说给大家听。他说：“你们不懂得，人常说，长安非久居之地。你不信，在西安城很难找到有第三辈人的家。为什么？第一辈人置家当，到第二辈人差不多就给“董”完了，哪能轮上第三辈人呢。”舅父说着，大家都深有体会地苦笑

了。舅父的这些话，使我终生难忘。

舅父常给我们谈及杨先生的一些琐事。他说，杨一生都是精神抖擞，充满活力，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露出退缩的情绪。而是非常乐观，具有战胜任何艰险的气魄。试想，由原来一支微小的乌合之众，竟而发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战斗部队，这真是一个奇迹。

在谈到杨的学习时说：杨聪明绝顶，但主要的是有毅力，有决心。他博闻强记，从原来识字有限，经过刻苦学习，礼贤下士，竟然成了一位知识丰富，学问渊博的人，真不寻常。并说，他什么都学，而且学得很快，他的知识有几次竟然难倒他所送出的国外留学生，岂不难能可贵。

舅父又特别提到杨先生是个孝子。说杨主陕后，日每公务再忙，总要抽空去母亲处请安，经常在老太太跟前说说笑笑，借以赢得母亲的欢心。舅父又说，有几次，不知为什么得罪了老太太，老太太生了气，杨立即跪在母亲的面前，为

母亲解忧，致使母亲破涕为笑。这又是常人所作不到的事。至于对部下来说，既严肃又和蔼。他赏罚分明，且又平易近人。因此，无论是文士或武官，都忠于杨的事业。特别是手下的一些健将，只要杨一声令下，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用兵用人如此，亦所以成功之原因。

此后，我以在外求学，与杨先生接触的机会就少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后，那时我正在东京，听见外面卖“号外”，跟着好心的房东就把“号外”给我送来了，而且又惊又笑地对我说：“快看，快看，你们家乡的大事。”我一看，啊！原来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我一直看了好几遍，不禁欢笑若狂。立即出访同学，谈论这件事。随后，我回了一次家。舅父为我谈了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事，他很兴奋。特别提起红军，说他们真称得起所谓“王者之师”。这时红军正驻三原一带，为舅父所耳闻目睹。舅父并说，杨要与红军合作，则前途是不可

限量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又返回东京，继续攻读。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清晨，东京又出了“号外”。其头版头条上大书“抗日巨头杨虎城抵横滨”等字样。我看了又惊又喜。心想，能不能在这里见杨叔一面呢？随后，决定去横滨试一试。杨是搭美国“胡佛”号轮船经日本前往欧美去考察的。我到横滨后，环视轮船码头附近，都布有日本便衣警察，我在那里徘徊了一个时辰，终于趁机问明了杨的船仓号数，找到了杨先生。杨叔一见是我，抓住我的两手激动地说：“哎呀，想不到在这里能见到你！”这时，他穿一身白西装，打着整齐的领带，戴金丝眼镜。我心里说：

“哟！杨叔简直成了一位博士先生了，哪里是抗日巨头杨将军呢？”杨叔说：船要在这里停留八个钟头，随行的人都上街玩去了，只他一人在船上。他说：船靠岸后，一群记者即包围了他，问他对“西安事变”的感想，他只是简单地应付了

一下。我问起他这次出国的目的，都去哪些国家？参观些什么？他侃侃而谈，好象背书似的谈他要去的地方，是那样的熟悉。特别是对那些国家地方名称、工厂名字一连串的外文，他都记得烂熟，使我真钦佩他的记忆力。他说着，又补充说：“我这只是个计划，是人家给我安排的，不一定符合我的想法；在可能的时候很想改变一下这个死计划，到我所需要的地方去。”我说：

“暑假后，我准备去法国继续求学。”他听了很高兴，叫我事前给他去电，他一定在法国接我。接着，他给我谈了舅父的一些情况。他说今春在三原为舅父祝寿，他专程去住了几天。舅父说这一时期身体还好；临走时，又专门去看了舅父，并留了一笔钱。说这钱主要是给我们几个学生上学用的学费。他对舅父是无微不至地关怀。

同时，杨叔又触动感情地谈起“西安事变”的一些事。他又兴奋而又感慨。末了说：“我要抗日，却要叫我去游山玩景，这不是矛盾吗？”

看起来，他是不愿离开他的部队，不得已而去出国考察的。随后，又谈到一些别的问题，问起我的学习、生活，问起陕西留日同学的情况等等。我在船上待的时间不短了，我恐影响他的安全，便告辞。杨叔依依不舍。临别时，又特别叮嘱我，要我一定去法国，说他一定在那时等我。我走出大船后，好久，好久心情未能平静。谁会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与杨叔最后一次的永别啊！

紧接着，“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我回了国。在三原给舅父讲了我在横滨见杨先生的经过。舅父叹息地说：“也好，看一看人家先进的国家，会广更多的见识；但不知你杨叔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说：“抗战了，理应让他早些回来。”舅父说：“这是天真的想法，蒋介石能相信他，让他回来抗日吗？”

就在这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樊雨龙突然来舅父处，说杨先生叫他先回来。他是坐意大利船提前一周抵香港。杨先生叫他先到三原舅父处打

个招呼，再到东里堡看看老太太。舅父问明了经过，满不以为然地对樊雨龙说：“你快去东里堡看看老太太，不要停留，马上回西安去香港接杨先生。你对杨先生说，叫他无论如何先回西安为上策，一定要吸取汉卿的前车之鉴，谨防坠入罗网。切记！切记！”樊匆匆地走了，舅父一直在等待着。谁知杨的消息越来越坏。继而，得悉杨夫人等也失掉了自由。杨先生在哪里？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以至各方面的营救与呼吁均付诸东流。舅父每一念及，也只有长叹而已！

舅父自杨主陕后，任陕西省政府高等顾问之职，家庭生活主要靠每月薪俸维持。一九三八年春，舅父忧国忧民，郁郁不乐，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时，孙蔚如任陕省主席，孔从周任三原警备司令。他们对舅父的健康非常关心，不时前来探望。孙特别叮嘱孔说：“蒙先生的病，你要负责，尽心关照！”的确，孙从西安为舅父请来医生，孙亦亲自四处延医、多方照应。他们来后，

经常与舅父谈及杨先生，怀念杨先生。

舅父教诲我们说：他一生戎马奔波，一无建树；多少年来，总想在家乡办个学校，而始终力不从心。幸而杨与辅丞都接受了他的建议，创办了尧山中学和崇实中学，也算是了却了他的夙愿。至于他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书。舅父在病情临危时，把他的日记拿出来，叫我看他在日记后面所写的几个较大的毛笔字。我念道：“要看仇人下场，要看敌人灭亡，老夫不死。”舅父问我：“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说：“懂。仇人指蒋介石，敌人指日本帝国主义。”舅父微笑说：“好！好！”我知道舅父是关心抗战，怀念杨先生。这时抗日的烽火已点燃中华民族的每个角落，可抗日英雄却被囚在杳无人烟的黑暗牢笼中，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吗？

舅父的病，终于医治无效，竟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与世长辞。后事悉由孙蔚如主席主持办理一切。

舅父一生胸怀若谷，疾恶如仇，治军严，其在事也，能理繁剧，任劳怨。所遗诗文不多，惜均佚失。至其他遗物，如井勿幕、于右任、杨将军及多少人的信札，照片等，詎料数十年沧海桑田，亦散失不存。

以上回忆，谨献给敬爱的舅父与尊敬的杨虎城将军在天之灵，以表寸心。其中有些事迹是我含着泪水写出的。虽然属于生活细节，但也是诚挚的记述。

·阴息众·